

# 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以《鴛鴦春膳》與 《睡眠的航線》中的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為例\*

劉亮雅\*\*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 摘 要

戒嚴時期，公共論述中的日治時期記憶，大致都需符合國民黨官方所強調的中國民族主義、抗日仇日。國民黨官方視臺灣人為被日本殖民奴化，壓抑、否定日治時期記憶，使得被壓抑記憶之復返過程曲折。一九七〇到九〇年代末期以抗日為主軸，夾雜認同矛盾，九〇年代末期以來則出現親日觀點，並與抗日或認同曖昧觀點並置，視野極其矛盾複雜。本文以李昂《鴛鴦春膳》與吳明益《睡眠的航線》中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為例，探討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我將討論反記憶如何涉及國族認同？日本殖民現代性所帶來的文化混雜如何影響認同？是否使得認同問題化或複雜化？本文認為，兩書都將反記憶的悲情轉化為以日治時期的文化混雜作為臺灣認同的基礎。

**關鍵詞：**近期臺灣小說，日治時期，重新記憶，反記憶，認同，混雜

---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重新記憶日治時期：以幾篇後解嚴小說中的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為例」(NSC 102-2410-H-002-148-MY3) 成果之一。感謝游雁茹、王彥筑、甄瑩三位助理幫忙蒐集資料，也很感謝《清華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的寶貴意見。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yliou@ntu.edu.tw

## 一、前言

戒嚴時期臺灣，在國民黨官方主導論述的掌控下，對於日治時期記憶，大致都需符合國民黨官方所強調的中國民族主義、抗日仇日的基調，才能出現於公共論述。換言之，是透過對日治時期的貶抑、否定，來強化中國認同：強調日本殖民主義的負面性適足以證明國民黨取代日本統治的正當性，強調國民黨代表中國正統正足以證明曾受日本統治的臺灣人民乃是被「殖民遺毒」奴化、需要被「再中國化」的人民。透過廢日語、去日本化和白色恐怖，壓抑日治時期記憶成了五〇、六〇年代中國認同的基礎。七〇年代因臺灣遭逢外交重挫，日本殖民記憶才大量出土，但卻需迎合主導文化，標舉抗日反日；八〇年代本土論者則開始將日治時期當作正面資產。歷經解嚴、後殖民化，九〇年代末期至今，日治時期記憶反而成了臺灣認同的部分基礎，用以對抗中國認同，並抵抗國民黨在戰後對臺灣的再殖民。

蕭阿勤最早從國族歷史敘事與世代概念角度，深入研究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國族認同與日治時期記憶出土的關係，但他並未針對戰後小說作分析。<sup>1</sup> 許俊雅探討戰後小說中有關臺灣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的記憶與國族認同，不過她對國族認同的討論稍嫌模糊。<sup>2</sup> 邱貴芬的兩篇文章延伸蕭阿勤的看法。其中一篇論及七〇年代「回歸鄉土」「對臺灣歷史記憶的贖回」，一方面綜覽七〇年代小說對日治時期記憶的呈現，另一方面批判蕭阿勤的看法稍嫌鐵板一塊，沒有觀照七〇年代出土的日治時期記憶也有內爆中國民族主義之處；<sup>3</sup> 另一篇則從紀錄片《跳舞時代》(2003)出發，認為九〇年代末期以來電影和紀錄片對日治時期記憶的正面呈現乃是重組記憶，走出悲情，凸顯日本統治所帶來的現代性，並重新自我定位為跨國文化交融下

<sup>1</sup> 蕭阿勤，〈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9.1（臺北：2002），頁 181-239。本篇後來稍經修改收入氏著專書，見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第 3 章〈回歸現實世代、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與抗日集體記憶〉，頁 141-200。本文都引用後者。

<sup>2</sup>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臺南：2006），頁 59-93。

<sup>3</sup>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臺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收入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著，《臺灣小說史論》（臺北：麥田出版，2007），頁 250-254。

的臺灣。<sup>4</sup> 林怡君則比較日治時期臺灣小說中的「抵抗日本殖民」論述與《海角七號》(2008)、《八田與一》(2009) 等近期電影中「美好的殖民記憶」兩者的斷裂。她認為賴和等日治時期作家為了替底層大眾發聲，並在「異族日本」統治下保存臺灣文化特色，因此需要強調漢文化身分；反觀九〇年代末期以來，臺灣本土化政治勢力則已逐漸取得地位，且面對中國崛起及全球華文熱，因此轉而需要強調日本記憶，以便區隔臺灣與中國，甚至臺灣與其他華人地區。<sup>5</sup>

本文延續了前行學者對日治時期記憶與國族認同的關注，而將焦點放在近期小說中對此議題的呈現。我試圖以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 理論切入，強調相對於官方的民間記憶及其在公共論述中的重返。不同於邱貴芬認為九〇年代末期以來「民間觀點」影像製作所呈現的日本記憶已非民間記憶與官方記憶的對抗關係，<sup>6</sup> 本文認為基於國民黨長達三十八年戒嚴的威權遺緒以及臺灣民主化之後轉型正義的缺乏，解嚴後許多日治時期記憶的重返、記憶的重組依然具有針對戒嚴時期民間 vs. 官方對抗的濃厚意涵，換言之，其本身就是一種去殖民的實踐，特別是在本文主要處理的兩本小說(集)《鴛鴦春膳》(2007) 與《睡眠的航線》(2007) 之中。<sup>7</sup> 但源於主角的社經地位、世代、教育方式等差異，這些反記憶也有其異質性。與此同時，本文也認為重新記憶與認同會隨著時間、國內外局勢與自我定位而有所變化。另一方面，戒嚴時期的中國認同涉及了「純正」「忠誠」與否的判讀。1977 年朱西甯曾質疑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臺灣「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sup>8</sup> 葉石濤則在八〇年代有關「皇民文學」的爭議中，仍須強調皇民化時期文學的「抗日」立場：「沒有『皇民文學』，全是『抗議文學』」，<sup>9</sup> 才能讓其辯護被接受；在在顯示七〇、八〇年代在中國認同主導下日本化作為「不忠」、「不純」的負面符號，乃至於公共論述無法探討日本殖民遺產及其轉化至今的影響。然而時移事往，經過本土化與民主化，混雜不純的反而成

<sup>4</sup> 邱貴芬，〈「日本」記憶與臺灣新歷史想像〉，收入梁秉鈞、許旭筠編，《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二期香港號 (2006)) (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頁 82-84。

<sup>5</sup> 林怡君，〈書寫的斷裂：日本記憶在臺灣的轉換〉，《臺灣學誌》，7 (臺北：2013)，頁 109。

<sup>6</sup> 邱貴芬，〈「日本」記憶與臺灣新歷史想像〉，頁 84。

<sup>7</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吳明益，《睡眠的航線》(臺北：二魚文化，2007)。

<sup>8</sup> 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收入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頁 219。本文最早刊於 1977 年《仙人掌》第 2 期。

<sup>9</sup>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1990)，〈「抗議文學」乎？「皇民文學」乎？〉，頁 112。

為資產，且具有重塑臺灣認同的重要意義。

本文將以《鴛鴦春膳》與《睡眠的航線》中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為例，探討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第二部分將探討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重新記憶的歷史脈絡，再以「反記憶」的角度切入，第三部分將探討《鴛鴦春膳》中反日的「祖國」派轉向臺灣認同的幽微曲折，第四部分將探討《睡眠的航線》中戰爭世代臺灣人的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第五部分結論則借用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1895-1975) 與巴巴 (Homi K. Bhabha) 的「混雜」(hybridity) 理論，從《鴛鴦春膳》與《睡眠的航線》中的混雜出發，再論臺灣歷經解嚴以來文化政治的變化，混雜如何能形成一種反論述。

## 二、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重新記憶的歷史脈絡以及「反記憶」

國民黨政府在戰後壓抑、否定日治時期記憶，有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侵略所產生的仇日情結，1949 年敗於共產黨、恐懼失去臺灣作為最後據點以及其作為外來統治者對臺灣焦慮恐懼等等諸多因素；「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雷厲風行乃是為了保衛其統治正當性。<sup>10</sup> 這一部分我將把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放在戰後對日治時期重新記憶的脈絡，再以福柯的「反記憶」理論切入。我認為戰後被壓抑記憶的復返必然於不同時期出現不同面貌：從七〇、八〇年代向國民黨官方論述輸誠、與之某種程度妥協，到近期小說走向臺灣認同，深入對日治時期殖民遺產和多重精神面貌的探討。

1946 年，也就是接收臺灣後的第二年，國民黨政府廢除了日語，並制定北京

<sup>10</sup> 黃英哲以「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描述 1945-1947 年陳儀時期的文化政策，我則以「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描述國民黨政府從戰後到解嚴的文化政策。黃英哲認為陳儀不同於之後的國民黨政府，例如陳儀延攬左翼的許壽裳為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讓楊雲萍領導臺灣研究小組整理、抄錄、編譯日本人的臺灣研究成果，開啟了戰後臺灣學；許壽裳並宣揚其摯友魯迅的思想。但黃英哲也指出，臺灣作家一致反對陳儀等官員宣稱臺灣人被日本文化「奴化」的說法，而 1946 年臺灣本地民營報紙、雜誌更群起反對廢日文，例如吳濁流便有激烈言論。見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2007），頁 108-118、149-180、205-221。如同許雪姬指出，雖然陳儀、許壽裳都是知日派，並未全面否定日本文化，但他們「剛性強制學習國語」，讓臺灣文化的重建「只能是一元化即中國化」，此一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重建「也是一種占領指導」。見許雪姬，〈附錄二：評《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收入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頁 291、290。換言之，就是「再殖民」。

話為國語，使得受日語教育的世代頓失重要的表述語言。這不但凸顯了國民黨政府強力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政策，也成了 1947 年二二八爆發的其中一個因素。歷經二二八的血腥鎮壓，1949 年戒嚴令的頒布以及白色恐怖，中國民族主義透過黨國體制而成為戒嚴時期的主導文化。戒嚴時期歷史教科書刻意忽視臺灣，尤其日治時期臺灣，而將焦點放在同一時期的中國歷史；在二二八後文學場域裡也由跟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外省人逐步掌控了文化資本，<sup>11</sup> 大致呼應國民黨反日、仇日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日治時期作家在五〇年代初多半不是已亡故，尚未跨越語言障礙，就是因白色恐怖繫獄。<sup>12</sup> 影響所及，五〇、六〇年代有關日治時期的記憶幾乎是禁忌。直到七〇年代初期在遭逢釣魚臺事件、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中國」席次、與日本斷交等一連串嚴重外交挫敗與創傷後，不分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掀起了一股關切政治與社會問題的熱潮，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流亡心態，重新瞭解臺灣歷史以及所屬世代的歷史位置，日治時期的記憶才得以大量出土。<sup>13</sup> 但由於「回歸鄉土」世代早已內化國民黨所灌輸的中國民族主義，他們將自己的反帝訴求連結到日治時期新文學初期的反帝，試圖將日治時期文學的集體記憶「納入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透過將之「再度『（中國）民族化』」而「再認同、再確認他們自己的中國性」。<sup>14</sup> 年輕知識分子標舉日治時期文學中的抗日；與此同時，抗日也成了重新記憶日治時期的基調。戰爭期作家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1968-1976)、李喬《寒夜三部曲》(1979-1981) 等大河小說都以抗日為主軸。<sup>15</sup>

<sup>11</sup> 陳建忠指出，二二八事件前臺灣作家和外省作家在臺灣文學場域的實力相當，各自表述，然而二二八之後外省作家則在官方扶持下掌控了絕大多數文藝媒體，歌雷主編的《臺灣新生報》「橋」副刊鼓勵本省作家創作，便成了當時最重要的文藝版，也因此「橋」副刊上在 1947 年底至 1949 年發生了一場臺灣文學論爭。這場論爭顯示，即使對臺灣作家比較友善的左翼外省作家仍擺出指導者的姿態，而楊逵等作家則藉由標舉賴和等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傳統，試圖反制外省作家的無知與歧視。見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 (1945-1949) 臺灣文學論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07），頁 123-125、160-166。

<sup>12</sup> 例如楊逵是二二八後少數在公共場域裡仍十分敢言的跨語言作家，但旋即在 1949 年四六事件中因之前撰寫的「和平宣言」被捕，成了第一批被送往綠島的政治犯，繫獄十二年。葉石濤在 1945-1949 年戰後初期十分活躍，也在 1951 年因白色恐怖被關三年，一直到 1965 年才復出文壇。

<sup>13</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 3。例如對鍾理和、楊逵等日治時期新文學作家產生濃厚興趣，掀起對日治時期新文學探討與研究風潮，遠景和明潭出版社並於 1979 年分別推出兩套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大部頭文選，其中也翻譯了一些日文作品。

<sup>14</sup> 同前引，頁 172、195。

<sup>15</sup> 鍾肇政，《沉淪》（《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臺北：蘭開書局，1968）；鍾肇政，《插天山之歌》（《臺灣人三部曲》第三部）（臺北：志文出版社，1975）；鍾肇政，《滄溟行》（《臺灣人三部曲》第二部）（新竹：七燈出版社，1976）；李喬，《孤燈》（《寒夜三部曲》第三部）（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李喬，《寒夜》（《寒夜三部曲》第一部）（臺北：遠景出

然而除了抗日敘事，七〇年代也浮現了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1956)、鍾理和〈夾竹桃〉(1945)、〈白薯的悲哀〉(1946)<sup>16</sup> 裡臺灣人既非中國人也非日本人的認同危機與矛盾。《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在二戰末期以日文寫成，書稿版本及書名歷經變遷，直到 1956 年才在日本出現正式的日文版，1962 年才在臺灣出版了較好的中文譯本。鍾理和的〈夾竹桃〉收入《夾竹桃》一書，1945 年在北平出版，戰後極少受到特別注意，直到 1976 年張良澤整理出版《鍾理和全集》，才引起陳映真的批評，作為他抨擊葉石濤在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裡提出的臺灣意識的接續砲火。<sup>17</sup> 應鳳凰指出，陳映真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批判〈夾竹桃〉的「錯誤」，讓人注意到〈夾竹桃〉裡「原鄉失落」的認同危機，卻恰恰展現了陳映真自己的「『中國民族意識』如何作為一種意識形態」。<sup>18</sup> 邱貴芬則一針見血地發現：在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時期，日治時期的記憶是以強調抗日精神，向當時臺灣社會中國民族主義主導文化「輸誠」、證明自己的「中國性」的方式解除壓抑、重返社會，但其實吳濁流、鍾理和的「記憶書寫已內爆中國民族主義敘述和『中國性』，認同的游移曖昧已引起焦慮」。<sup>19</sup> 邱貴芬指出，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第二部《滄溟行》(1976) 裡也涉及「殖民教育體制下，臺灣人認同的掙扎」。<sup>20</sup> 認同的游移曖昧不但內爆中國民族主義敘述，也凸顯歷經日本統治後的文化混雜。

戒嚴時期壓抑日本殖民記憶，受日語教育的戰爭期世代之歷史經驗與記憶尤其備受打壓。<sup>21</sup> 雖然日語世代未必等於皇民，但不可否認地都受到了日本文化（尤

版社，1980）；李喬，《荒村》（《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

<sup>16</sup>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臺北：草根出版，1995）；鍾理和，〈夾竹桃〉，收入張良澤編，《夾竹桃》（《鍾理和全集》第一卷）（臺北：遠行出版社，1976），頁 1-64；鍾理和，〈白薯的悲哀〉，收入彭瑞金編，《鍾理和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 93-101。〈白薯的悲哀〉最早以筆名江流發表於 1946 年《新臺灣》第 2 期。

<sup>17</sup> 葉石濤在 1977 年 5 月《夏潮》第 14 期發表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標舉以臺灣為中心的鄉土文學，引爆了鄉土文學論戰。見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入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72。

<sup>18</sup> 應鳳凰，〈鍾理和文學發展史（代序）〉，收入應鳳凰編，《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頁 12。應鳳凰指出，鍾理和遠迢迢從臺灣投奔原鄉，〈夾竹桃〉乃是他居住北京六年的生活觀察（包括大雜院所呈現的中國人性格的陰暗面以及他如何在戰爭時期的北京一再被當成日本人），而陳映真在 1977 年論戰期間撰文批評鍾理和的〈夾竹桃〉時，則還不曾去過中國；兩者相較，應鳳凰想問，「到底誰的『民族意識』才是全憑想像的？」同前引。

<sup>19</sup>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臺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頁 254。

<sup>20</sup> 同前引，頁 253。

<sup>21</sup> 日本統治臺灣，由初期的漸進主義與分離主義，到二〇年代的同化政策（亦即內地延長主義），

其日本所帶來的現代性)的影響，漢文化的認同較低。誠如周婉窈指出，1946年廢日語，讓這個世代成了「失落的世代」：

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變局中，失去了辛苦學得的語言和文字，以及附著在這個語文的教育資產；他們當中許多人在新社會變成文盲……最嚴重的是，在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中國的統治下，他們被迫對自己的過去與群體的過去，保持近乎絕對的沉默。

……他們是歷史的失敗者，在中壯年期未得身居社會的主流。<sup>22</sup>

然而周婉窈卻又認為「這個失落的世代以沉默的方式對歷史作出了尚待估量的影響」，「這些有聲或無聲的沉默，從各種層次抵銷了國民黨統治下學校和社會教育的成效」。<sup>23</sup> 周婉窈所說的「歷史的失敗者」以及其存在於民間或社會底層有聲

---

到1937年侵略中國，為了動員殖民地人民，而改採皇民化政策。雖然日本殖民政府1937年才正式廢除報紙的漢文欄，然而由於透過公學校教育可以取得現代知識，在皇民化運動「國語家庭」的獎勵之前，知識分子說日語、以日文創作的風氣已經開始。二〇年代臺灣新文學運動之初，就有日文小說，而楊達與龍瑛宗分別在1934年與1937年以日文小說獲得日本文藝大獎，更是印證。

<sup>22</sup>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代序，頁12。

<sup>23</sup> 同前引，頁12、13。例如1974年，鄉土文學健將楊青矗接受李昂訪談時，便顯示日語世代一方面被迫噤聲、另一方面私下批判國民黨統治，「抵銷」其統治。根據楊青矗的觀察，受日本教育的戰前世代「瞭解日本人，也瞭解中國人；時代的嬗變使他們感性敏銳，凡事都會拿中國人的作法和日本人的作法對比」。楊青矗所熟識的日語世代精通日文，卻無法以中文書寫表達，他們「厭惡日本人欺壓……但也懷念日本人的好處」，以此對照國民黨統治下「社會上貪污，或其他他們看不順眼的事情」。楊青矗坦承，年少時認為這些日語世代奴性難改，年歲增長後較能瞭解他們，卻又認為他們只敢私下以「日本精神」聊天宣洩，因此「藉他們這面對比的鏡子透視了我身為中國人的真面目」。見李昂，〈喜悅的悲憫：楊青矗訪〉，《書評書目》，24（臺北：1975），頁84。楊青矗這段訪談一方面顯示日語世代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卑屈以及七〇年代楊青矗自身的中國認同，另一方面則顯示日語世代的記憶潛伏於民間，透過臺語、客語、原住民語或混雜的語言仍可傳遞給戰後世代，成為批判國民黨統治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民間聲音。

另一方面，周婉窈在其書中對照戰前與戰後倫理教育的差異，也足以顯示日語世代為何可以看出國民黨統治的問題。周婉窈指出，日語世代所受到的公學校教育中「修身書」強調「對國家社會之責務」，影響很大。「對社會之責務」包括社會倫理與社會公益兩個面向。社會倫理可以連結到西村茂樹所說的「消極的公德」，亦即「個人行為應避免造成對他人或公眾的損害」；社會公益可以連結到西村茂樹所說的「積極的公德」，亦即「個人應當對他人、社會、國家的利益有所主動貢獻」。公學校教育強調公德的消極面，以其為邁向積極面的公德的基礎，「這與目前臺灣社會強調積極面而忽略消極面，恰成鮮明的對比」。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324、326、329。

與無聲的「沉默」，則令人想起福柯所說的「反記憶」、「反歷史」(counter-history) 等概念。

福柯的「反記憶」、「反歷史」解構官方歷史敘述的真理性，揭露其中所蘊含的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在他的文章〈尼采、系譜學、歷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中，福柯提出了反記憶理論。他指出，官方歷史標舉的大寫的歷史其實歷經刪除、壓抑他者的記憶，因此其真理性需要被質疑，反記憶乃是出現在官方歷史的矛盾、縫隙和斷裂處，這些長期被忽視的記憶打破了官方歷史的宰制，揭示官方歷史的真理性及其神話性的權威有問題。<sup>24</sup> 福柯的反記憶著重系譜學式地找尋小寫的、地方的記憶，例如弱勢族群的記憶。在《社會必須被捍衛》(“*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中福柯指出，反歷史扮演了兩種不同的角色，其一是打破了官方歷史的統一性。由於官方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反歷史讓失敗者異質的歷史也得以呈現：「從權力的眼光看來是權利、法律、義務，從新的論述的角度看，卻是濫權、暴力、強徵」。<sup>25</sup> 其二是反歷史破解了官方歷史所營造的歷史連續性。由於官方歷史展現出權力的效果「照亮了社會體的一面，卻讓另一面落入陰影或陷入黑暗」，<sup>26</sup> 反歷史反映或生產了一個民族或社群被忽視的過往斷裂、空白、空隙的時刻。如同梅迪納 (José Medina) 指出，福柯批判官方歷史的刻意遺漏與沉默噤聲乃是知識論與社會政治的征服，因此唯有透過檢視那些斷裂、空白、空隙，才能批判式地抗拒官方歷史所隱含的知識／權力框架，關注那些原本活在沉默與黑暗中的人們的生命經驗、記憶與論述。<sup>27</sup>

經過長期打壓後重返的記憶將原本破碎的記憶碎片重組，也帶有更多的反思和釐清。我以為，這種自覺性乃是一種重新記憶。而此一重新記憶，就其與官方歷史的關係，當然是一種「反記憶」，挖掘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官方歷史的矛盾、縫隙和斷裂處，是「歷史的失敗者」、他者在尋找意義與身分認同。戒嚴時期「歷史的失敗者」並不僅止於日語世代、戰爭世代，廣義上，受過日本統治的臺灣人都算是；而其國族認同也絕不單純，從臺灣認同，中國認同到日本認同都有，也可能在

<sup>24</sup>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39-164.

<sup>25</sup>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p. 69-70. 此處引文為筆者中譯。

<sup>26</sup> *Ibid.*, p. 70. 此處引文為筆者中譯。

<sup>27</sup> José Medina, “Toward a Foucaultian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 Counter-Memory, Epistemic Friction, and Guerrilla Pluralism,” *Foucault Studies*, 12 (2011), pp. 16-17.

不同的認同之間擺盪。重新記憶乃是重新與那段歷史記憶協商，反思日本殖民遺緒，在深層的意義上也是重新思考自我的定位或臺灣的未來。縱使七〇到九〇年代末期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絕大多數是抗日仇日，它仍無法完全納入「中華民國」的抗日敘事。首先，「中國」在絕大多數的記憶裡若非顯得遙遠陌生，就是完全缺席。其次，就算戰爭世代都被描繪為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壓迫剝削，但不論是陳千武〈獵女犯〉(1976) 中的慰安婦，或鄭清文〈二十年〉(1970) 與宋澤萊〈最後的一場戰爭〉(1976) 中從南洋歸來的臺灣兵，<sup>28</sup> 均顯示臺灣人的二戰經驗截然不同於「中華民國」的歷史敘事，因而暴露了後者的矛盾、縫隙和斷裂。或許這些抗日的重新記憶仍會引發「中國性」不足的焦慮，就像前面所引用的朱西甯、陳映真對於日治時期臺灣作家「中國性」不足或中國認同忠誠度不夠深感焦慮，而這不但彰顯了日本統治的遺緒以及臺灣人的漢認同並不等於中國認同，也凸顯許多抗日記憶為了向官方輸誠所套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外殼只是妥協或偽裝。

另一方面，國民黨官方的抗日仇日敘事仍相當程度限定了日治時期記憶在公共論述裡被容許表達的範圍，乃至大大削弱了上述反記憶在主導文化中的影響力，直到歷經解嚴、後殖民化，在九〇年代末期以來的小說與電影裡，才能看到大量對日治時期記憶比較正面或複雜多樣的描寫。<sup>29</sup> 毋庸置疑，這些反記憶是更加被壓抑的記憶，也更能揭露國民黨官方歷史的矛盾、縫隙和斷裂。成長於戒嚴時期的許多人並不知道早在日治時期臺灣就有國語經驗、義務教育、現代化、棒球、原住民九族分類、鄉土文學論戰、政治與社會運動等。施叔青的《微醺彩妝》(1999) 透過紅酒熱，觸及了臺灣承襲自日治時期的公賣制與棒球；<sup>30</sup> 舞鶴《餘生》(1999) 則揭露霧社事件中親日與抗日兩派賽德克族人的內鬥，預示了魏德聖的電影《賽德克巴萊》(2011) 所呈現的多元聲音，<sup>31</sup> 《賽德克巴萊》細膩描繪花崗一郎在賽德克族認同與日本認同之間的掙扎，令人動容。陳玉慧的《海神家族》(2004)、施叔青的

<sup>28</sup> 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臺中：晨星出版，1999），〈獵女犯〉，頁 113-155，本篇最早發表於 1976 年《臺灣文藝》第 52 及 53 期；鄭清文，《校園裡的椰子樹》（臺北：三民書局，1970），〈二十年〉，頁 1-38；宋澤萊，《等待燈籠花開時》（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最後的一場戰爭〉，頁 147-196，本篇最早發表於 1976 年《中外文學》第 5 卷第 5 期。

<sup>29</sup> 例外則如葉石濤的《異族的婚禮》(1994) 描寫戰爭末期的跨種族（包括臺灣人與日本人，琉球人與西拉雅人，漢人與西拉雅人）的友誼與婚戀，吳念真的電影《多桑》(1994) 刻畫受日本教育的戰爭期世代與受國民黨教育的世代之間國族認同的對立，都透露日本殖民遺緒。葉石濤，《異族的婚禮》（臺北：皇冠文化，1994）。

<sup>30</sup> 施叔青，《微醺彩妝》（臺北：麥田出版，1999）。

<sup>31</sup> 舞鶴，《餘生》（臺北：麥田出版，1999）。

《風前塵埃》(2008) 和《三世人》(2010) 裡除了分別呈現抗日的臺共、抗日的太魯閣族、抗日的漢遺民之外，都有因嚮往日本現代性或日本文化而日本化的人物，描寫其掙扎於臺灣認同與日本認同之間。<sup>32</sup> 而從《海神家族》中琉球籍外婆與漢人外公、二叔公，魏德聖的電影《海角七號》(2008) 中的臺日之戀，到《風前塵埃》中灣生日本女子與太魯閣男人之戀，跨種族愛情與婚戀都隱喻了文化混雜。這些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記憶無疑是矛盾複雜的，反日與親日都有。反記憶與認同政治涉及日本殖民統治所帶來的文化混雜，而這在後殖民臺灣也成為臺灣文化特殊性的資產。

以下將以兩位戰後世代作家李昂的短篇小說集《鴛鴦春膳》與吳明益的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中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為例，探討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這兩本小說的背景都是九〇年代，敘述者都是戰後世代，父母親則屬於戰前世代，因此都將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放在與戰後記憶的比較上。《鴛鴦春膳》中的父親在日治時期受傳統漢文私塾教育、拒絕學日語，《睡眠的航線》中的父親則是日語世代；《睡眠的航線》中的父親親日，《鴛鴦春膳》中的父親和《睡眠的航線》中的母親則都反日，但即使反日，在戰後也歷經變化。《鴛鴦春膳》和《睡眠的航線》中的父親都白手起家，但前者是富商、鄉紳，後者則在中華商場開電器行。《鴛鴦春膳》中女性敘述者與父親關係親密，熟悉父親的故事，《睡眠的航線》中敘述者則與父親疏離，在父親失蹤後才開始訪查父親的故事。不管對任何世代，重新記憶都是一種歷史重建。兩本小說中摻雜很多口述記憶，特別彰顯了反記憶的主題。我將探討反記憶如何關乎國族認同政治？又如何涉及文化混雜？文化混雜如何影響認同？是否讓認同問題化、複雜化？反記憶如何以文化混雜做為新的認同的基礎？

### 三、《鴛鴦春膳》中反日的「祖國」派轉向臺灣認同的幽微曲折

《鴛鴦春膳》以食物記憶串聯八篇系列故事，洪珊慧的兩篇論文已分別探討書中食物與記憶、政治、性別的交纏，<sup>33</sup> 食物書寫所隱含的身體、旅行、國族與歷

<sup>32</sup> 陳玉慧，《海神家族》（臺北：印刻出版，2004）；施叔青，《風前塵埃》（臺北：時報文化，2008）；施叔青，《三世人》（臺北：時報文化，2010）。

<sup>33</sup> 洪珊慧，〈記憶、政治、性別與食物的交纏：析論李昂飲食小說的隱喻符碼〉，收入焦桐編，《味覺土風舞：「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魚文化，2009），頁

史論述。<sup>34</sup> 不同於洪珊慧比較關注書中戰後的食物記憶，我將焦點放在書中有關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的部分。第一人稱敘述者王齊芳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乃是以王齊芳之父的口述記憶為核心，旁及有關王齊芳的大舅、二伯母的家族記憶，以及王齊芳對日本遺緒的記憶。由於這些記憶不同於戒嚴時期官方歷史，因此構成了反記憶。這些反記憶又涉及認同和文化混雜的複雜議題。反日的父親歷經國民黨政權的大屠殺，對「祖國」幻滅，並深刻地感到臺灣文化被視為太「混雜」而遭貶抑，但他的反記憶卻堅持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發展的文化，以之為臺灣認同的基礎。

《鴛鴦春膳》以王齊芳第一人稱往事追憶錄的方式書寫，尤其以鹿港的家族故事為骨幹。日治時期的記憶被鑲嵌在王齊芳的童年記憶之中，包含對童年感受與經歷的重建以及年長後的認知，前者感性抒情，後者則帶著理性。第一篇〈果子狸與穿山甲〉(2004)<sup>35</sup> 所出現的詭異的 (uncanny) 禁閉黑暗空間想像，擾亂了王齊芳的童真無憂，連結到戰爭與歷史糾葛。王齊芳一邊在廢棄的防空洞裡玩扮家家酒，一邊目睹工人「闖雞羅漢」宰殺穿山甲與果子狸，而父親則親自烹煮；她對二次大戰留下的防空壕及穿山甲假死、捕食螞蟻有此鬼魅恐怖想像：「那『假死拉狸』與『防空壕』便在她的夢中一直成了一個禁閉的黑暗的所在。一片一片的鱗一開一闔，釋出的可以是『魔神仔』、鬼、妖怪……關進去的，可會她的魂魄？」<sup>36</sup> 雖然這是小女孩的夢魘幻想，卻與父親曾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被抓的恐怖經驗有所連結（雖然他避而不談），而反倒與父親日治時期的記憶較無關聯；這樣的交錯為父親的重新記憶預留了伏筆。年長後王齊芳得知，小時候四處可見的防空洞是在戰爭末期為了躲避美軍轟炸所蓋，但小鎮被炸的時間既不長也不多，戰後證實都是誤炸；然而幼時她納悶，淹大水時漂浮的各種物件為何都留在這些地下的防空洞：「好似所有遺失的東西，都會在淹水的『防空洞』裡找到。那淹水的『防空洞』像變魔術，能將失落的東西變回來，只不知是哪裡出了問題，變回來的東西都殘了、破了（或者本該如此？）」<sup>37</sup> 防空洞成了時間的殘餘，但同時也將所有失落的東西變壞，這似乎隱喻了未經國民黨官方面對的民間記憶如鬼魅纏繞。

214-231。

<sup>34</sup> 洪珊慧，〈透視飲食書寫——李昂《鴛鴦春膳》的身體、旅行、國族與歷史論述〉，收入江寶釵、林鎮山編，《不凋的花季：李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合文學，2012），頁297-321。

<sup>35</sup> 本篇最早於2004年7月31日到8月2日刊於《聯合報》副刊。

<sup>36</sup> 李昂，《鴛鴦春膳》，〈果子狸與穿山甲〉，頁32。

<sup>37</sup> 同前引，頁13。

父親和家族長輩都歷經日治到國民黨統治，因此父親對官方歷史的反記憶既是個人記憶，也是屬於家族（甚至鹿港民間）的共同記憶。異乎國民黨官方歷史作為福柯指出被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諷稱的「紀念碑歷史」(monumental history) 是一套聲稱具有絕對真理、統一連續的歷史進程的大敘述，反記憶與反歷史則是「有效歷史」(effective history)，不認為有所謂統一連續，並肯定知識具有觀點 (perspective)。<sup>38</sup> 王齊芳承繼了父親的反記憶，嘲諷國民黨官方歷史所採用的「日據時代」、「祖國」等字眼，<sup>39</sup> 因〈咖哩飯〉(2007)<sup>40</sup> 中父親其實是以「日本時代」指稱日本統治時期。<sup>41</sup> 迥異於官方歷史的「光復」、「回歸祖國」敘述，父親則認為「遠從北方前來統治的『中華民國』政權，從日本人手中接收島嶼」，<sup>42</sup> 後來又「造成二二八大屠殺」。<sup>43</sup> 對父親而言，國民黨政權乃是二二八事件的加害者，連鹿港聞人施江南也槍斃，<sup>44</sup> 而〈素齋〉(2006)<sup>45</sup> 中二伯母的功德堂則因供奉二二八中被形同滅門的施家家族牌位而被視為「有勇氣」。<sup>46</sup> 王齊芳長大後才得知，父親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抓、險些喪命，讓原本懷有強烈漢文化認同、拒絕學日語的他，也拒絕學北京話，且從此避不談政治。他既不認同日本政權，也不認同國民黨政權，他的反日因此截然不同於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所強力灌輸的中國民族主義。最反諷的是，父親的口述記憶呈現了國民黨政權遠比之前的日本政權殘暴，而父親也深刻地體會到，他的漢文化認同並不等於戰後國民黨政府所標舉的中華文化認同。

〈咖哩飯〉呈現的反記憶主要是父親曾在三〇年代末期和一位日本作家吃西餐的經驗，才旁及父親不肯學兩種國語的歷程。源於一位日本作家的回憶錄裡，提到曾來到殖民地臺灣，在臺北鐵道旅館接受臺灣人盛情款待，卻點了咖哩飯，王齊芳因此印證了父親的故事。但觸動父親回憶此事的另一個原因是王齊芳成了女作家，讓父親深感自豪，在心理上能夠擺脫昔日作為殖民地人民的卑屈；在更深層的意義

<sup>38</sup>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pp. 160, 161, 156.

<sup>39</sup> 李昂，《鴛鴦春膳》，〈果子狸與穿山甲〉，頁 22。

<sup>40</sup> 本篇最早於 2007 年 6 月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sup>41</sup> 李昂，《鴛鴦春膳》，〈咖哩飯〉，頁 43。

<sup>42</sup> 同前引，頁 36。

<sup>43</sup> 同前引。

<sup>44</sup> 同前引，頁 38。

<sup>45</sup> 本篇最早刊於 2006 年《鹽分地帶文學》第 2 期。

<sup>46</sup> 李昂，《鴛鴦春膳》，〈素齋〉，頁 241。

上，這補償了父親歷經了兩次國語經驗無法真正發聲的邊緣感。相對於父親被兩個殖民政權陰性化，王齊芳作為女作家則進入公領域發聲。父親對此事的重新記憶吐露了對兩種政權的幽微心曲，讓王齊芳串連到其他有關父親與食物的故事。本篇意涵複雜，但大致可分成三部分：首先，有關皇民化時期父親在臺北鐵道旅館吃的西餐。其次，有關父親歷經戰前正宗的外省菜演變為戰後式微的酒家菜。最後，有關九〇年代的日式咖哩飯。

相反於戒嚴時期官方歷史忽略日治時期臺灣，令人以為西餐在臺灣始自於戰後，父親的反記憶卻見證日治時期三〇年代曾在臺北鐵道旅館吃過當時最高檔的西餐，但當時乃是英式為主（可能摻雜一點日式與臺式），因臺灣總督府由日本海軍派任，而日本海軍又崇拜英國海軍。這與戰後的西餐以美式為主（因國民黨依賴美援文化）大相逕庭。<sup>47</sup> 戰後日式洋食料理繼續存在，與美式西餐並存，標示了不同時期受西方現代性影響下不同的文化混雜。

西餐傳布到歐美以外地區與歐美殖民主義及文化霸權息息相關。作為殖民主義的後進國，日本由原本被半殖民，靠著明治維新、模仿西方、打破封建制度而進入列強。王齊芳好奇：日本「帶到臺灣來的『二度殖民』西方化，究竟是如何呢？能超越日本菜成為當時臺灣富商款待重要貴客的『西餐』……對島嶼人們，特別是父親那代人，又有著甚麼意義呢？」<sup>48</sup> 皇民化時期父親是因為想一嚐西餐才跟著大舅應邀出席日本作家訪臺的餐宴，但對於進入當時全臺灣第一家現代化洋式大飯店吃西餐並沒有足夠的信心。<sup>49</sup> 比較特別的則是，父親對於吃西餐的好奇與經驗一方面透露出由於政治、經濟等因素，西餐很難吃到，乃至於很難想像，另一方面顯露出他作為殖民地人民對於「世界」的嚮往，渴望瞭解與比較。

父親對於西方現代性抱持著既抗拒又嚮往的態度。一方面，父親原可以將春天出生的敘述者取名為「美英」，卻因不願令人聯想到「英國」、「美國」而改叫「齊芳」，西餐也一直不是他的最愛，顯示他的漢文化認同。<sup>50</sup> 但另一方面，他又送子女去歐美讀書，不願在子女面前顯出不懂西餐禮儀。因此他對西方現代性的嚮往，與其說是艷羨自卑，不如說是參考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希望繞道經由學習

<sup>47</sup> 〈國宴〉(2005) 顯現戰後蔣介石時期，由於貧窮與鎖國，一般人民很難想像蔣宋美齡吃的西餐。李昂，《鴛鴦春膳》，〈國宴〉，頁 164-191。〈國宴〉最早於 2005 年 12 月刊於《聯合文學》第 254 期。

<sup>48</sup> 李昂，《鴛鴦春膳》，〈咖哩飯〉，頁 57。

<sup>49</sup> 同前引，頁 55。

<sup>50</sup> 同前引，頁 37。

西方來改變被殖民的命運，或更進一步以臺灣主體而非被殖民的客體進入世界，與其他國家競爭與比較。

戰前最正宗的外省菜變為戰後「不入流」的酒家菜則是父親的一大傷痛，父親的反記憶顯示戰後在國民黨統治下，文化資本被掌控在外省菁英手上，乃至於有強烈漢文化認同的臺灣人也被邊緣化。日治時期父親與大舅常去「蓬萊島酒家」吃外省菜，因「蓬萊島酒家」的業者去中國考察，挑選了最適合臺灣人口味的福建、廣東、四川一千多道菜，由孫中山大元帥府的名廚掌廚，被視為全臺最正宗的外省菜。雖然這些菜如同西餐一樣，也是外來的料理，父親偏愛則顯示他對於中華料理的興趣和某種程度的「祖國」認同。<sup>51</sup> 不料 1949 年隨著國民黨政府逃難來的中國各省大廚嫌這些菜是「『混省菜』，不夠道地，血統不純正」，<sup>52</sup> 而原本只是商人聚會場所的「酒家」也淪為直接交易情色的場所，菜色不再重要，廚師紛紛離開，這些菜從此被稱為「不入流」的酒家菜。<sup>53</sup> 這顯然是一種文化權威的爭奪，有關「正宗的外省菜」和「酒家」的定義在 1949 年後完全變了，而臺灣人失去了對這些詞語的定義權。

酒家菜被貶抑，與其說是因為「混省」，不如說是因為加了臺灣味（不管是實質上或精神上），這隱喻了當時國民黨政府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將臺灣文化（即便是其中最迎合「祖國」文化的如酒家菜）都視為混雜的劣質贗品。這令人想起國民黨將其帶到臺灣來的正統中國白話文定為國語，讓即便是日治時期兩次臺灣文學論爭中自稱為「中國白話文派」的文體也被視為不正統，而受到貶抑與批評，更別說臺灣話文派與日文派了；<sup>54</sup> 由於戰後白話漢字的文化權威掌控在外省知識分子

<sup>51</sup> 父親是日治時期成功的商人，銷家具到日本，曾因做生意去過中國南方；回到父祖的「原鄉」——中國福建時，他卻傷感於無親無戚的全然陌生。同前引，頁 38-39。他不像戒嚴時期制式地稱孫中山為國父，而改以其短暫地擔任軍政府陸海空大元帥的頭銜稱呼孫，顯現他如果曾有「祖國」認同，也並不強烈。

<sup>52</sup> 同前引，頁 48。

<sup>53</sup> 同前引。

<sup>54</sup> 陳培豐在《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中對於臺灣現代漢文文體的演變有深度研究。他指出，如同拉丁文曾流傳於歐陸，漢字漢文也流傳於東亞，成為東亞各地的重要文化資產，然而自十九世紀起，以日本為首的東亞各地興起了語文現代化運動，揚棄傳統漢文，改以口語體方式書寫。見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2013），頁 299-300。日本在領臺初期，訴諸「同文」治理其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當時臺灣既有本身的漢文，又有日本人帶來的大量和式漢字與漢文以及「祖國」的漢文，不同的漢文交混之下發展出殖民地漢文，不但成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所共有，成了臺灣各報紙漢文欄的文體，對臺灣人而言這也是漢文現代化的開端，但 1920、1930 年代臺灣文學的幾次論爭從中國白話文派發展到臺灣話文派，則讓殖民地漢文混雜臺語的比例增高，成為臺灣人所獨享，乃至於 1937 年殖民政府展開軍事動員

手上，臺灣知識分子不得不淡出文壇。<sup>55</sup> 對於日治時期堅持不學日語、以福佬語教子女讀千家詩三字經、某種程度心向「祖國」的父親而言，戰前正宗的外省菜淪為戰後式微的酒家菜無疑對他的「祖國」認同是一大打擊，族群歧視劃開了省籍差異、文化差異與位階。只要以正宗道地的中華文化傳人自居，外省人就擁有文化霸權，掌握文化資本。但父親繼續吃所謂「不入流」的酒家菜，對於後來流行的港式粵菜毫無興趣。父親透過描述從前上蓬萊島酒家的趣事（包括廚師在廚房裡穿高腳木屐以及父親與大舅在酒家裡被稱為「黑白郎君」的由來），顯示他對酒家菜的記憶與認同乃是相對於主流霸權的反記憶，質疑、擾亂了戒嚴時期主流霸權對外省菜僵化的標準與詮釋，也顯現他的漢認同不同於國民黨的中華認同。反諷的是，〈牛肉麵〉(2005)<sup>56</sup> 卻顯示，一般以為來自四川的牛肉麵卻是在臺灣才產生的，是 1949 年國民黨部隊來臺後軍中伙夫所製，所謂的正宗也可能是混雜。父親的經驗顯示，他的漢文化和（特別是 1949 年國民黨政府所帶來的）中華文化差異很大。他的臺灣漢文化曾被後者貶抑為不正宗、不入流；即使後來證明兩者都是混雜的文化，兩者也相當不同。

父親談到九〇年代蔚為風潮的日式咖哩飯，串聯了六十年前他參與的歡迎餐宴裡日本作家所點的咖哩飯和當下的流行，也就是串聯了日治時期與九〇年代的哈日熱，父親展現的卻是強韌的臺灣口味，並隱含臺灣認同。日式咖哩飯是日本人改良異國美食後的最愛，早在六十年前的臺灣就出現了，父親和喜愛日本菜的大舅卻都不吃，因當時除了少數家庭外，臺灣人並不特別喜好辛辣食物。當九〇年代日式咖哩名店在臺設分店，強調夏威夷 Maui 洋蔥、日本名古屋的雞、美國艾達荷或秘魯的馬鈴薯等「世界頂級」食材時，父親不以為然，認為臺灣在地食材更好：「只要是來自同樣的一塊土地，……種出來的米、菜，養出來的豬、雞，擺在一起作出來的菜，味道就會是對的」。<sup>57</sup> 但另一方面，日本作家吃到的咖哩飯，卻附加了肉

---

時以國防為由廢除了報紙的漢文欄。在此之後只有華僑以傳統漢文或更純粹的中國白話文書寫的漢文雜誌《風月報》一枝獨秀，但這卻是為了帝國擴張，向滿州和南洋宣揚大東亞新秩序之用。同前引，頁 302-305。陳培豐的基本論點是：臺灣人抗拒日本殖民但希求現代性，臺灣語漢文由於欠缺大量現代翻譯的錘鍊，又缺乏教育資源讓文體標準化，而未能成功地發展出一套定型的文體。同前引，頁 310-311。然而縱使失敗，臺灣話文派堅持屬於臺灣「文言一致」的白話漢文之主張，醞釀出脫離中國與日本的框限，構築「屬於自己的漢文共同體之趨向」，且臺灣話文派後來轉而投入三〇年代的臺語流行歌，影響力持續至今。同前引，頁 314。

<sup>55</sup> 同前引，頁 322。

<sup>56</sup> 本篇最早刊於 2005 年《鹽分地帶文學》第 1 期。

<sup>57</sup> 李昂，《鴛鴦春膳》，〈咖哩飯〉，頁 60。

鬆魚鬆等地配料。父親雖不喜愛咖哩飯，但日本人模仿西方後的自主改良也影響了他。他試圖以番薯取代馬鈴薯做臺式咖哩飯，也就是在混雜外來文化中仍保有臺灣味，雖然後來失敗了，卻仍透露他有意在全球化文化混雜中強調臺灣文化認同。王齊芳說臺灣人原本認為番薯是低賤食物，然而「由於多年來的外來政權統治，島民稱外形近似蕃薯的臺灣島嶼為『蕃薯仔島』，自稱作『蕃薯囡仔』」。<sup>58</sup> 近年來番薯更翻了身，以其富含維生素又能抗癌而被某衛生組織評選為十大健康食物之首，<sup>59</sup> 藉此她暗示臺灣認同自九〇年代逐步取代了中國認同。

不論是反日、強調漢文化的父親，或皇民化、親日的大舅，他們的食物透露出一種在地性以及在地性地在選擇性地接受外來文化之下的文化混雜。父親吃野味來自於漢文化的食補觀念，<sup>60</sup> 吃酒家菜來自於日治時期對外省文化的心儀，但也嘗試吃西餐。皇民化的大舅，風雅偏食，戰後長居東京，只吃日式炸豬排和臺式白斬雞，喜愛可樂、焦糖蛋糕與紅豆麵包，亦即混雜日式、臺式與西式。兩人展現的在地性與混雜性都與日治時期歷史經驗有關。〈珍珠奶茶〉(2007) 中王齊芳也強調臺灣麵包裡所透露的日本殖民遺產：「不論在日本、臺灣，都共用『PON』來稱『麵包』，原是葡萄牙文的『PON』，隨日據時代作麵包的技術傳到臺灣」，沿用至今，連臺灣人在烘好的麵包外皮裡加甜餡，也是延續日本人的口味。<sup>61</sup>

總結來說，《鴛鴦春膳》顯現父親對日治時期的記憶摻雜了他對後來國民黨統治的觀感。透過父親和家族的口述記憶，王齊芳呈現在日治時期原本反日的父親如何在二二八後對國民黨幻滅，又如何發現自己的漢認同不同於國民黨統治下的中華認同。父親的反記憶一方面強調他之所以兩次拒絕了國語，乃是堅持臺灣認同，拒絕兩個殖民政權對臺灣人的歧視，另一方面他的反記憶緬懷日治時期臺灣人所自主發展出的漢認同，既抗拒又嚮往透過日本所接收的西方現代性，則暗示臺灣在選擇性地接受外來文化下所自然發展的本土文化必然是混雜的文化，此一混雜的文化曾經被國民黨貶為不純正、不入流，雖然後來證明國民黨所帶來的也是混雜的文化。日治時期反日的父親，到了戒嚴時期，反而堅持臺灣日治時期的混雜文化，藉以顛覆國民黨政府和某些外省菁英所標舉的正統中華文化，乃是要展現臺灣的特殊性才是臺灣認同的基礎。

<sup>58</sup> 同前引，頁 61。

<sup>59</sup> 同前引。

<sup>60</sup> 敘述者後來得知《本草綱目》裡提到鱉肉的療效。

<sup>61</sup> 李昂，《鴛鴦春膳》，〈珍珠奶茶〉，頁 88。

#### 四、《睡眠的航線》中戰爭世代臺灣人的反記憶、認同與混雜

不同於《鴛鴦春膳》中的父親受傳統漢文私塾教育、拒絕學日語，《睡眠的航線》中的父母親則是成長於戰爭期的日語世代。《睡眠的航線》裡第一人稱敘述者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主要以重建屬於日語世代的父親被壓抑、遺忘的記憶為核心，旁及母親的口述記憶，時間上則從二次大戰到國民黨接收後的劇變。由於這些記憶不同於戒嚴時期官方歷史，因此構成了反記憶。這些反記憶涉及了認同和混雜的複雜議題，包括父親歷經兩種政權的認同錯亂迷惘，父母親需要翻譯的語言與文化混雜，也包括敘述者如何將反記憶轉化為反歷史、反論述。

戒嚴時期歷史教科書採取中華民國史觀，因此二次大戰被解釋為對日抗戰，最後在美國、英國等盟軍協助下贏得勝利，但此一歷史敘述無法描述當時被日本殖民的臺灣人的戰爭經驗。敘述者在歷經父親失蹤、意外取回父親舊照與筆記後，從父親的私人記述輾轉開始了尋父之旅，揭開了反記憶。在書裡，「我」的敘述與三郎的故事交錯，但後者應是敘述者經由閱讀父親筆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料、口述史及赴日訪查所重建的。三郎的故事擴及少年工以外參戰以及戰爭下的臺灣人經驗，乃至於其他國家如日、美、韓等參戰者經驗，甚至包含敘述者對自然書寫、皇民化下的臺灣、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緒以及神是否存在等議題的關注。黃宗潔認為，「小說中之所以堆疊出如此繁複的架構與視野，或許正因每一種詮釋的背後，都仍存在著巨大而難以弭平的隙縫」。<sup>62</sup> 我認為這顯現《睡眠的航線》對二次大戰的反記憶是多元而複雜的，並不以弭平各種詮釋的隙縫為目標。

在展開尋父之旅前，敘述者所熟悉的家族故事是母親的家族故事，以及六〇年代父親來到臺北、在中華商場開電器行、直到中華商場被拆掉的歷史，卻不知父親曾在二戰末期在日本橫濱海軍兵工廠當少年工，也就是日軍的後勤。敘述者乃是在臺北長大的文藝青年、媒體工作者，起初對於父親三郎失蹤無感，然而神秘的睡眠異常和怪夢擾亂了他原有的秩序，讓他察覺潛意識中對父親的內疚，而啟動了尋父的歷程。在隱喻的層次上，睡眠異常和怪夢是脫離主流價值，走入不熟悉、被貶抑的記憶與時間。不同於《鴛鴦春膳》中的父女關係，《睡眠的航線》裡敘述者對父

<sup>62</sup> 黃宗潔，〈遠方的戰爭：論《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夢境與記憶〉，《東華漢學》，13（花蓮：2011），頁192。

親的過去一無所知，父親無法將其故事告訴兒子。父子關係斷裂，除了因父親個性沉默嚴肅，受日本教育對兒子較為嚴格之外，另一方面則因皇民化記憶在戒嚴時期是禁忌。父親三郎是歷經日本和國民黨統治的失語的世代，他的生命經驗和語言在戰後的臺北被打壓。<sup>63</sup> 不同於日本在統治臺灣四十多年後才廢漢文，國民黨在接收臺灣的第二年就廢日語、訂定北京話作為國語。戒嚴時期官方歷史強力地灌輸中國民族主義，將臺灣邊緣化，歷史課本不但忽視日治時期的臺灣，且忽視臺灣不同於中國抗日的戰爭經驗。這種排除本身即是將所有受日本統治過的臺灣人視為「歷史的失敗者」，以成就中華民國統一、連續的歷史。許多人因此不知道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國後，為了軍事動員，在臺灣、朝鮮等殖民地所展開的皇民化運動，<sup>64</sup> 也不知道 1942 年在臺灣開始實施的志願兵制度，<sup>65</sup> 讓八千名臺灣少年工自 1943 年日軍已露敗跡時，陸續被送往橫濱等地日軍軍火工廠幫忙製造飛機，<sup>66</sup> 歷經戰爭末期東京的大轟炸，其中一百多名被炸死或病死於日本。

三郎的反記憶呈現了他在被殖民以及政權轉移下對身分的迷惘。首先，由於血統論的因素，臺灣人究竟能否被認可為皇民是一大問題。但十二、三歲時在皇民化運動下他自願當少年工，的確是嚮往成為日本人、學習造飛機的技術、取得學歷，以逃離戰爭後期的貧窮饑餓。其次，以軍屬身分參戰，卻在戰爭結束時發現自己的國家變成異國，無疑令他錯亂。第三，他有無選擇自己身分的能動性？他又是如何選擇？無論是相較於在名古屋兵工廠被炸死的同鄉少年工大田秀男，或是相較於將天皇神化、無法接受日本投降的日本圖書館員平岡君，三郎都並非徹底的皇民。三郎年老時回想少年時「不太確定的未來，不太確定的身分，以及不太確定的哀傷」，不知活下來的意義。<sup>67</sup> 他偷偷報名當少年工，被父親掌摑才意識到此一工作的危險性，但年老時他回憶當年即使不當少年工，後來也可能被徵召去南洋打仗。

<sup>63</sup> 「失語」指的是在公共論述裡無法表述，敘述者仍可聽懂父母親夾雜日語的臺語，因此他對父親二戰經驗的無知比較是因為父親的緘默以及敘述者受到主導文化的影響所致。

<sup>64</sup> 皇民化運動包含改姓名、國語家庭、志願兵制度、改信仰等面向。

<sup>65</sup>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69。

<sup>66</sup> 志願兵包含軍人和軍屬（也就是在陸海軍工作的非軍人雇員），少年工乃是軍屬。海軍志願兵制度於 1944 年廢除，以便實施徵兵制；臺灣的陸海軍全面徵兵制則在 1945 年四月實施。同前引，頁 70。根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全臺灣包括軍人、軍屬總計有 207,183 人投入戰爭，其中死亡人數共 30,304 人。同前引。周婉窈指出，當時出現了志願兵熱潮，顯現皇民化運動對戰爭世代影響之深，其他造成熱潮的因素則是地方政府對年輕人的鼓勵與宣導，同儕壓力，以及殖民地人民想要證明自己不輸給日本人、甚至比日本人更優秀的民族尊嚴與競爭心理。同前引，頁 70-72。

<sup>67</sup>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 162。

日本無條件投降、帝國瞬間瓦解後，三郎身分的變化令他錯愕迷惘。美軍進駐後，少年工成了戰勝國，日本軍官和軍屬因此以一種「逃避的，甚至帶著點退縮的態度」面對少年工，<sup>68</sup> 三郎卻依舊無法放棄原來的皇民身分，天真地問「為什麼我們會被米國打敗呢？」<sup>69</sup> 少年工在美軍的認可下擁有戰勝國的特權，旅行時搭「進駐軍專用車」，但三郎感到「他曾經嚮往的卻在某個時間點就驟然轉移的身分落差……他隨時可能獲得什麼，也隨時可能失去什麼」。<sup>70</sup> 思鄉的他和大多數臺灣少年工一樣選擇返臺，這點顯示他的臺灣認同，但內心深處卻對於喪失原先的皇民身分和晉升機會感到不安、失落。<sup>71</sup> 由於他的身分仰賴美軍認可，三郎不確定究竟如何證明自己是戰勝國還是俘虜，<sup>72</sup> 而回到臺灣他又只憑一張紙和一張票被移交給語言不通的中國軍人。<sup>73</sup> 此處隱喻像他一樣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人在國民黨接收後形同俘虜，其歷史經驗、記憶和論述被刻意打壓遺忘，以便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官方歷史能維持其表面的連續性和統一性。

日本殖民現代性，借用福柯在《社會必須被捍衛》與《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的規訓理論，乃是透過體制的規訓和控制，滲透到日常生活，生產出馴化的身體，例如守時、衛生的習慣，對理性與進步的信念等等。<sup>74</sup> 對三郎而言，皇民化和現代性曾經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早在赴日前在岡山受訓時，他就被要求改用日本名字、說日語，戰爭期間他因此相信自己的身體主要是天皇的；基於對天皇的效忠，他忍受了在兵工廠所受到的嚴格訓練，這讓他的身體更加銘刻了日本現代性。戰後窮困節省的三郎在邈遠的中華商場仍維持了整潔的日本紳士派頭，<sup>75</sup> 並將他在主流社會被邊緣化、陰性化的困境轉為更父權式嚴格地教導兒女，每每引發青春敘述者的憤怒與抗拒。另一方面，他以少年工時期所學的現代技術為標竿，檢視美國、日本和臺灣製造的收音機，發現戰後臺灣的電器製造混雜了對美、日的模仿，但技術卻還不夠先進、訓練也不夠紮實，尤其年輕輩的技

<sup>68</sup> 同前引，頁 239。

<sup>69</sup> 同前引。

<sup>70</sup> 同前引，頁 266。

<sup>71</sup> 同學之中少數人決定留在日本，甚至也有人在戰後東京致富，但三郎對於他們不思念家鄉深感詫異。

<sup>72</sup> 同前引，頁 264。

<sup>73</sup> 同前引，頁 271。

<sup>74</sup>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p. 36-39, 249-25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sup>75</sup>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 133。

師容易自我滿足，「這和他少年時受過的訓練截然不同」。<sup>76</sup> 三郎的批評同時也暗指了國民黨時期的現代性與日治時期的現代性之差異。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習西方技術，混雜多種模仿，發展出卓越的獨特性；反觀強調中華文化的國民黨時期，技術上模仿美、日，同樣是混雜，卻沒有更上層樓。

珍子與三郎的二次大戰記憶有類似處，雖然一個在日本，一個在臺灣，都歷經了美軍轟炸。三郎對戰爭經驗的重新記憶，顯現出他對日本帝國的戰爭宣傳和其標榜的男性氣概的些許質疑，<sup>77</sup> 然而他仍對日本有某種情感認同，例如他喜歡日本神社的靜美，並未接受戰後國民黨的史觀和抗日敘事。1991年，三郎和其他少年工重返日本，拜訪昔日老長官，參觀廣島原爆醫院，巧遇反核大遊行；在原爆犧牲者親屬為死者放河燈的活動中，三郎也為兩位當年被炸死的少年工朋友放河燈。<sup>78</sup> 三郎懷疑自己內在某個部分渴望戰爭，靠觀世音保佑才能存活，所見的殺戮雖小，卻以天真少年之姿參與了殺戮，他既非有罪也非無罪。<sup>79</sup> 珍子對二次大戰的記憶則充斥著對戰爭最後一年遭到美軍轟炸、缺糧挨餓和日本警察查緝私藏糧食的恐懼，以及對媽祖神蹟的禮讚。一反戒嚴時期歷史教科書只描寫二次大戰時期中國的狀況，珍子的反記憶呈現二次大戰期間，許多臺灣人雖然討厭、畏懼日本殖民者，卻更加恐懼美軍的炸彈，因美國（而非日本）乃是敵軍。只因二次大戰後盟軍勝利，中國成了戰勝國，接收了臺灣，美其名臺灣也成了戰勝國，實際上臺灣被國民黨視為戰敗的一方，需要被納入中國中心的框架，接受再中國化。於是像珍子所經歷的日本殖民與二次大戰經驗，被戒嚴時期官方歷史遺漏噤聲，也因此唯有透過傾聽母親世代的故事，敘述者才可能發現官方歷史的斷裂和空隙。

三郎與珍子的反記憶關乎語言和認同。不同於三郎曾嚮往當皇民，歷經戰前到戰後認同的迷惘，珍子雖然反日，對戰後的新政權卻毫無反應，這或許因為戰後國語突然變為北京話，讓他們都變成社會邊緣、底層的人，無法發聲。對於屬於日語世代的他們而言，日語做為日治時期的國語有其不可抹滅的影響力，即使珍子因戰

<sup>76</sup> 同前引，頁 85。

<sup>77</sup> 敘述者對三郎與平岡君的呈現隱含了對皇民化和過分強調男性氣概的批判，透露出他受到當代性別意識的影響。三郎的皇民化並不徹底，他一上船就後悔，發現被騙，從來都在半饑餓狀態，對日本冬天的寒冷難以消受，也非常思鄉。他曾崇拜優雅如貴族的東京大學法學部學生日本人平岡君。因健康問題被拒入伍的平岡君將天皇神化、在日本投降時聲稱寧可戰死，但他原屬的軍隊到了菲律賓後幾乎全軍玉碎，他其實為存活感到興奮卻又鄙夷自己的興奮。同前引，頁 292、237-238。

<sup>78</sup> 同前引，頁 290-291。

<sup>79</sup> 同前引，頁 292。

爭之故，並未就讀公學校或只讀了一兩年，她所使用的臺語已摻雜了日語。一直到中華商場被拆、三郎失蹤以後，珍子仍需透過敘述者翻譯為臺語，才能瞭解電視上的北京話新聞。三郎也因為語言和曾是日軍之故，他所學到的製造、修理飛機的技術無法讓他在戰後臺灣進入公部門，而只能靠開電器行謀生。三郎的日語讀到中學，日本投降後他被「交還」給中國軍人，兩人難以溝通。中華商場快拆之時，三郎開始想跟孩子說故事，這也正是解嚴後臺灣開始由中國中心轉向臺灣中心、重新反省日本殖民遺緒之時，但曾經努力跟著兒子學中文的三郎依舊難以表述，自覺他的語言屬於另一種「文法、句型與修辭」，<sup>80</sup> 也就是日語為主、混雜臺語的文法。敘述者則說三郎的書寫混雜了漢字、日文、注音與萬國音標，有些漢字是以臺語發音，有些則是日文裡所使用的漢字，因此很難閱讀。<sup>81</sup>

然而三郎的反記憶隱然對於國民黨政府強制以外來的北京話作為國語、強調標準國語的政策有所批判，更暗示臺灣因為族群差異、不同時期的殖民經驗與移民而語言混雜，這種自然形成的多語以及語言混雜才是臺灣的真貌。三郎回溯中華商場之前五〇年代的竹仔厝時期，北京話尚未成為共通語，那時南腔北調語言複雜，「有人講日語、福州話、山東話，甚至阿美族話」，<sup>82</sup> 不論棄農北上或做生意失敗的臺灣人、或是跟隨國民黨來臺的外省軍人都無法「用同一種語言講話」，<sup>83</sup> 需要互相猜謎，每一種語言學一點，沒有人能講標準北京話，大家講的是如同「廣東仔賣的『雜菜麵』那樣的『雜菜話』」。<sup>84</sup> 眾聲喧嘩，不同的語言族群需要互相尊重、理解、翻譯，而非獨尊收音機裡聽不懂的「國語」，才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實臺灣。然而在戒嚴時期，儘管只有少數外省菁英和受教育的年輕世代能說標準北京話，臺灣國語（而非各種外省腔國語）卻曾經長期受到歧視。

敘述者試圖貼近父母的歷史記憶；他對二次大戰的重新記憶，乃是透過將父母親的反記憶轉化為反歷史，來重構臺灣人身分。他迂迴地顯示：父母親的二次大戰經驗所涉及的並非中國抗日，而是美日之間的太平洋戰爭。這也是他與中國學生王剛對二戰看法歧異的由來，雖然他不敢告訴王剛父親曾是日軍。<sup>85</sup> 他無法忍受王剛以中國民族主義角度對戰爭的看法以及對他的攻擊，這點暗示他同樣不接受國民

<sup>80</sup> 同前引，頁 89。

<sup>81</sup> 同前引，頁 277。敘述者說三郎曾教他萬國音標，讓他在採用 KK 音標的學校裡吃了很大苦頭，這點則顯示日治時期學校是採英式英文，而國民黨時期則是美式英文。

<sup>82</sup> 同前引，頁 87。

<sup>83</sup> 同前引。

<sup>84</sup> 同前引。

<sup>85</sup> 同前引，頁 254。

黨把臺灣納入其抗日敘事。在尋父之旅的最後，日本人白鳥醫師說起美軍毀滅式地轟炸日本城市，造成東京八萬多市民死亡，以及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被關進動物園之事，讓不曾經歷戰爭的敘述者感慨戰爭的殘酷。<sup>86</sup> 另一方面，他又體認到父母親作為存活下來的戰爭世代所傳給他的「避難基因」，<sup>87</sup> 父親對他嚴格是希望他能在災難中存活。他對美日雙方二戰歷史的研讀以及對父母親戰爭記憶的重新想像，暗示他在思考臺灣未來如何捍衛自己的存活戰略。

總結來說，《睡眠的航線》召喚被壓抑的戰爭世代臺灣人的記憶，乃是解除臺灣的國家失憶症，撫慰歷史失敗者、弱勢者的戰爭創傷，重新連結臺灣的戰前與戰後。小說並且顯示不論反日或親日，戰爭世代臺灣人的記憶都不同於國民黨的抗日敘事。敘述者藉由重構父親三郎的反記憶，凸顯底層的戰爭世代臺灣人歷經兩個政權、兩種「國語」經驗的錯亂迷惘。藉由父親回想五〇年代的竹仔厝多語言和語言混雜的情況，敘述者暗批戰後「國語」政策的粗暴以及對於日語、臺語、原住民語等臺灣人語言的禁止或打壓、歧視；再透過父親批判臺灣年輕技師的訓練不夠紮實，他彰顯國民黨時期的現代性比不上日治時期。與此同時，他也重新瞭解沉默的少年工父親，他曾討厭、反抗父親的威權和對男性氣概的強調，但尋父的歷程讓他逐漸瞭解受日本教育的父親所代表的臺灣存活的資產。敘述者以反戰抵制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敘事，並指出中國也發動過不少戰爭。藉此他顯示他的史觀乃是以臺灣經驗為中心，對於中國中心史觀提出了反歷史。

## 五、結論：混雜作為一種反論述

戒嚴時期有關於純正與混雜的二元對立及不同位階，到了解嚴後強調臺灣中心及多元族群之下已逐漸被消解。然而由於轉型正義未能落實，戒嚴時期的殖民與威權餘毒猶存。這讓我們需要重新閱讀有關混雜的理論，參照其所提供的重要視野。巴赫汀曾將語言的混雜區分為「有機的混雜」(organic hybridity) 與「刻意的混雜」(intentional hybridity) 兩種，前者指的是不同階層、族群交會時多種語言無意識地交混融合，而後者則刻意凸顯兩種以上不同的語言意識 (linguistic consciousnesses) 的並存，以雙音或多音挑戰單音的權威言說。「有機的混雜」所

<sup>86</sup> 同前引，頁 216-217。

<sup>87</sup> 同前引，頁 254。

形成的融合「蘊含生產新的世界觀的潛力，蘊含以字 (words) 觀視世界的新的『內在形式』(internal forms)」，<sup>88</sup> 而「刻意的混雜」則凸顯「即使同一個字也同時屬於兩種語言，兩種信仰系統，卻在一個混雜的建構裡交錯 (intersect in a hybrid construction)，也因此這個字有著兩種矛盾的意義，兩種腔調 (accents)」。<sup>89</sup> 巴巴則將「刻意的混雜」置於殖民主義的對話脈絡，指出「刻意的混雜」銘刻了他者的痕跡，「扭轉了殖民主義否認的效果，乃至他者『被否定』的知識進入了主導論述，疏離其權威基礎」。<sup>90</sup> 而同時，巴巴的「既不／也不」(neither/nor)「第三空間」(Third Space) 概念，則暗指「有機的混雜」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乃是新的文化，對於原來強調同質性的主導文化構成了文化差異。<sup>91</sup> 不過我認為，在有些情況下「有機的混雜」和「刻意的混雜」未必能清楚區分。

不管是《鴛鴦春膳》裡反日、受古典漢文教育的父親與《睡眠的航線》裡反日的母親，或《睡眠的航線》裡親日的父親，在戒嚴時期他們都體驗到，在中國中心強調中華正統之下，臺灣的語言與文化不是被視為太過混雜，就是被視為日本化、奴化，而遭到貶抑與打壓。但此一混雜或日本化乃是在殖民經驗以及不同族群（甚至屬於不同時期移民）相遇之中發展出來，也就是有機的混雜，例如《睡眠的航線》中戰爭世代的父母親在口語上混雜了臺語、日語，《鴛鴦春膳》中日治時期引進的中華料理混省且加了臺灣味，廚師則穿日本味的高腳木屐，都是有機的混雜。然而兩者在戰後都受到貶抑打壓，王齊芳之父卻繼續吃酒家菜，則是將之轉化為一種臺灣人的身分認同，使之與所謂的正宗中華料理相較，具有「刻意的混雜」的意味。《睡眠的航線》中父母親沉默地活在社會底層，從來沒有學會北京話，也隱含對國語作為殖民語言的抗拒。父親的書寫混雜了漢字、日文、北京話注音，有些漢字是以臺語發音，有些則是日文裡所使用的漢字，雖然對他本人而言乃是有機的混雜，但對於受北京話教育的閱讀者（如敘述者）則帶有「刻意的混雜」之效，以多音疏離了戒嚴時期標準中文的權威基礎，並凸顯包含中、臺、日等在內的漢字圈，雖然使用同樣的漢字，卻屬於不同的語言系統，未必能彼此溝通。《鴛鴦春膳》中日治時期引進的日式洋食與戰後美式西餐的並存，前者對於後者作為西餐的權威也構成了「刻意的混雜」；父親實驗以番薯取代馬鈴薯做臺式咖哩飯，則試圖以「刻

<sup>88</sup>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 360. 此處引文為筆者翻譯。

<sup>89</sup> *Ibid.*, pp. 304-305. 此處引文為筆者中譯。

<sup>90</sup>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14. 此處引文為筆者中譯。

<sup>91</sup> *Ibid.*, pp. 28, 36-37.

意的混雜」在全球化文化混雜中強調臺灣文化認同。

另一方面，要讓前述的文化和語言的混雜產生巴巴所說顛覆或抵抗殖民主義否認的效果，仍需要相當的物質基礎。在戰後的二三十年間，被打壓貶抑、甚至失語的臺灣人民主要是靠著民間與社會底層說臺語、客語、原住民語、日語的龐大人口所具有的潛在力量，而能以文化和語言的混雜抵制再殖民；之後國內外局勢變遷，從七〇年代國民黨政府失去其在國際間代表中國正統的合法性、美麗島事件，到八〇年代的本土化、民主化運動，「臺灣」符號逐漸由負轉正，混雜便更能發揮顛覆或抵抗殖民主義否認之效。<sup>92</sup> 國民黨政府和少數外省菁英獨尊純正中華文化的心態，曾經挾帶了流亡者的文化沙文主義以及仇日情結。但所謂正宗、正統通常都經由政治力、文化力的建構，標準化的歷程，而文化和語言的實際發展則往往是各種社會力角力、匯集、混融之下的產物。二〇年代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受到之前梁啟超吸納日本現代翻譯所創的「經濟」、「物理」等和式漢字做為這些詞語的現代意義；中國白話文本身也是混雜。而 1949 年國民黨政府所帶來的正宗中華文化也早已難以抵擋來自臺灣民間及社會底層混雜的滲透。何況戰後臺灣一直與美、日有戰略連結，乃至於美、日新殖民主義文化也帶來了混雜。隨著中國崛起，武力威脅升高，臺灣的民主多元與中國的極權專制之差異拉大，反而促發了臺灣民族主義。在臺灣認同增強之下，許多外省人（尤其第二代）早已把臺灣視為家鄉，也開始對他們的臺灣經驗做歷史溯源：不只是《鴛鴦春膳》中提到的四川牛肉麵，連溫州大餛飩、蒙古烤肉也並非從中國原汁原味地帶來，而是在臺灣才生產出來的，是帶了臺灣味的混雜的產物。而當今臺灣與中國所使用的日常漢語語彙之差異，同一詞不同義之狀況，更透露兩邊屬於不同國度。尤有甚者，不少外省人也體認到，在變化的世局裡，為了臺灣的民主、生存與利益，必須要揚棄中國民族主義與仇日心態，重新瞭解臺灣這塊土地上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

歷經民主化、本土化以及多元的思想洗禮，許多人發現對歷史的重新記憶涉及了對臺灣未來的期待與想像。尤其臺灣當今對日本的觀感、與日本的關係、對自我的認同，相當程度影響了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鴛鴦春膳》和《睡眠的航線》中，將反記憶的悲情，轉化為以日治時期的文化混雜作為臺灣認同的部分基礎。這令人想起葉石濤在〈臺灣文學本土化是必然途徑〉(1992) 裡指出，緣於迥異的歷史經驗，臺灣與中國早已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臺灣文化固然含有中華文

<sup>92</sup> 但與此同時，八〇年代以來國語（北京話）教育與文化政策的鞏固，造成許多新世代無法說流利的臺語、客語、原住民語，喪失對母語和自我文化的認同，乃至於 1988 年母語運動興起。

化，但也融合了臺灣原住民以及荷蘭、西班牙、日本殖民文化，甚至美國、日本新殖民主義文化，並非中華文化的一部分。<sup>93</sup> 葉石濤將臺灣放在更長遠的歷史脈絡，彰顯混雜乃是臺灣文化的特色，臺灣因其特殊的歷史經驗、多重殖民帶來的「重層現代性」而展現出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文化混雜，而這也是臺灣認同的基礎。當然這並不是說殖民主義和移民帶來的正宗日本文化、正宗中華文化不存在於臺灣，而是它們和正宗原住民文化一樣，都只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更多時候文化之間的有機交混和刻意混雜充斥於日常生活之中。

（責任校對：王淳容）

---

<sup>93</sup> 葉石濤，《展望臺灣文學》（臺北：九歌出版社，1994），〈臺灣文學本土化是必然途徑〉，頁17。本文最早刊於1992年《文學臺灣》第4期。

## 引用書目

- 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收入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頁 204-226。
- 李 昂，〈喜悅的悲憫：楊青矗訪〉，《書評書目》，24，臺北：1975，頁 74-87。
- \* \_\_\_\_\_，〈《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
- 李 喬，〈《孤燈》〉（《寒夜三部曲》第三部），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
- \_\_\_\_\_，〈《寒夜》〉（《寒夜三部曲》第一部），臺北：遠景出版社，1980。
- \_\_\_\_\_，〈《荒村》〉（《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
- \*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臺北：二魚文化，2007。
-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臺北：草根出版，1995。
- 宋澤萊，〈《等待燈籠花開時》〉，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
- \* 林怡君，〈書寫的斷裂：日本記憶在臺灣的轉換〉，《臺灣學誌》，7，臺北：2013，頁 89-120。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 \* 邱貴芬，〈「日本」記憶與臺灣新歷史想像〉，收入梁秉鈞、許旭筠編，《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二期香港號 (2006)），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頁 80-95。
- \_\_\_\_\_，〈翻譯驅動力下的臺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收入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著，《臺灣小說史論》，臺北：麥田出版，2007，頁 197-273。
- 施叔青，〈《微醺彩妝》〉，臺北：麥田出版，1999。
- \_\_\_\_\_，〈《風前塵埃》〉，臺北：時報文化，2008。
- \_\_\_\_\_，〈《三世人》〉，臺北：時報文化，2010。
- 洪珊慧，〈記憶、政治、性別與食物的交纏：析論李昂飲食小說的隱喻符碼〉，收入焦桐編，《味覺土風舞：「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魚文化，2009，頁 214-231。
- \_\_\_\_\_，〈透視飲食書寫——李昂《鴛鴦春膳》的身體、旅行、國族與歷史論述〉，收入江寶釵、林鎮山編，《不凋的花季：李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合文學，2012，頁 297-321。
- 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臺中：晨星出版，1999。

- 陳玉慧，《海神家族》，臺北：印刻出版，2004。
-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 (1945-1949) 臺灣文學論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07。
-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2013。
-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臺南：2006，頁 59-93。
- 許雪姬，〈附錄二：評《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收入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2007，頁 277-301。
- 黃宗潔，〈遠方的戰爭：論《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夢境與記憶〉，《東華漢學》，13，花蓮：2011，頁 173-194。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2007。
-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入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頁 69-92。
- \_\_\_\_\_，《臺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1990，〈「抗議文學」乎？「皇民文學」乎？〉，頁 109-112。
- \* \_\_\_\_\_，《展望臺灣文學》，臺北：九歌出版社，1994，〈臺灣文學本土化是必然途徑〉，頁 11-17。
- \_\_\_\_\_，《異族的婚禮》，臺北：皇冠文化，1994。
- 舞鶴，《餘生》，臺北：麥田出版，1999。
- 鄭清文，《校園裡的椰子樹》，臺北：三民書局，1970。
- \*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
- 應鳳凰，〈鍾理和文學發展史（代序）〉，收入應鳳凰編，《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頁 1-28。
- 鍾理和，〈夾竹桃〉，收入張良澤編，《夾竹桃》（《鍾理和全集》第一卷），臺北：遠行出版社，1976，頁 1-64。
- \_\_\_\_\_，〈白薯的悲哀〉，收入彭瑞金編，《鍾理和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 93-101。
- 鍾肇政，《沉淪》（《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臺北：蘭開書局，1968。
- \_\_\_\_\_，《插天山之歌》（《臺灣人三部曲》第三部），臺北：志文出版社，1975。
- \_\_\_\_\_，《滄溟行》（《臺灣人三部曲》第二部），新竹：七燈出版社，1976。

- 
- \* 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 \* \_\_\_\_\_.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 \_\_\_\_\_.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 Medina, José. “Toward a Foucaultian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 Counter-Memory, Epistemic Friction, and *Guerrilla Pluralism*,” *Foucault Studies*, 12, 2011, pp. 9-3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Chiu, Kuei-fen. "Ribei Jiyi yu Taiwan Xin Lishi Xiangxiang (Memories of "Japan" and Taiwan's New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Ping-kwan Leung and Amanda Yuk-kwan Hsu (eds.), *Dongya Wenhua yu Zhongwen Wenxue, Dongya Xiandai Zongwen Wenxue Guoji Xuebao Dierqi Hong Kong Hao 2006 (East Asian Culture &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vol. 2 Hong Kong Issue 2006)*. Hong Kong: Ming Pao Publication, 2006, pp. 80-95.
-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_\_\_\_\_.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 Hsiau, A-chin. *Huigui Xianshi: Taiwan 1970 Niandai de Zhanhou Shidai yu Wenhua Zhengzhi Bianqian (Return to Reality: The Postwar Generation and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in the 1970s)*.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8.
- Li, Ang. *Yuanyang Chunshan (Passion Foods)*. Taipei: Unitas, 2007.
- Lin, Yi-chun. "Shuxie de Duanlie: Ribei Jiyi zai Taiwan de Zhuanhuan (Rupture in Writing: Japanese Colonial Memories in Taiwan Discourse)," *Taiwan Xuezhì (Monumenta Taiwanica)*, 7, 2013, pp. 89-120.
- Wu, Ming-yi. *Shuimian de Hangxian (Routes in the Dream)*. Taipei: Fish & Fish, 2007.
- Yeh, Shih-tao. "Taiwan Wenxue Bentuhua Shi Biran Tujing (Localiz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an Inevitable Approach)," in *Zhanwang Taiwan Wenxue (Envisioning Taiwan Literature)*. Taipei: Chiu Ko, 1994, pp. 11-17.

## Re-Memory of Taiwan's Japanese Period in Recent Fiction: The Instance of Counter-Memory, Identity, and Hybridity in *Passion Foods* and *Routes in the Dream*

Liou, Liang-y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liou@ntu.edu.tw

### ABSTRACT

Under martial law, most memories about the Japanese Period (1895-1945) had to comply with the KMT's Chinese nationalist narrative and its anti-Japan or Japan-bashing discourse in order to get published. Seeing Taiwanese as enslaved by Japanese colonialism, the KMT repressed and negated memories about the Japanese Period; consequentl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assumed different aspects in different times in the post-war era: anti-Japan mostly with some delineations of identity conflict from the 1970s to the late 1990s, and pro-Japan in juxtaposition with anti-Japan and split identity since the late 1990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re-memory of the Japanese Period in recent fiction by studying as an instanc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er-memory, identity formation, and hybridity in Li Ang 李昂's short-story collection, *Passion Foods* 《鴛鴦春膳》, and Wu Ming-yi 吳明益's novel, *Routes in the Dream* 《睡眠的航線》. All set in the 1990s, these works explore re-memories of the Japanese Period in comparison with post-war memories under the KMT. I will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es counter-memory entail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How does cultural hybridity brought about by Japanese colonial modernity affect identity formation? Does it problematize or complicate identity? How does counter-memory deploy hybridity as a basis for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 maintain that both books transmute the sadness of counter-memory into a recognition that the cultural hybridity formed during the Japanese Period serves as a basis of Taiwanese identity.

**Key words:** recent Taiwanese fiction, Taiwan's Japanese Period, re-memory, counter-memory, identity, hybridity

(收稿日期：2014. 3. 17；修正稿日期：2014. 5. 20；通過刊登日期：2014. 11. 25)